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协同机理与改革路径^{*}

张世贵

摘要:城乡要素市场化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要适应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城乡之间要素高效公平、自由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城乡二元化、等级化的特征明显,就土地、资本、劳动力、数据等要素而言,其利用率、收益率、利润率、工资率、普及率和应用率等仍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别。为此,需要建构统筹城乡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的叠加配置机制,通过“知识协同”(即知识主体、空间、时间、环境四维协同),提高“数字+”要素的配置效率、生产效率、经营效率和流通效率,并以此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城乡融合;要素市场化;“知识协同”;改革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1-0070-07

一、问题缘起与文献回顾

我国城乡发展具有鲜明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①,长期的生产要素错配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②。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不仅强调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的优化配置,还关注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市场培育与配置。该意见为实现城乡要素公平有效配置和自主有序流动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出了总体要求。然而,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将政策导向落实为具体的实践路径,还需要理论界在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城乡要素配置市场二元格局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探索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的城乡协同发展机制及其核心要素之间的协同机理,为提高要素质量以

及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供参考。

目前,学界对城乡要素优化配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要素领域,对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的研究比较多。例如,在分析要素配置城乡二元结构方面,张克俊等将阻碍我国城乡市场要素平等交换的主要因素概括为城乡要素权利不对等、城乡要素二元市场体系以及城乡要素收益分配不公平。^③周传豹等基于对城乡要素收入转移量的测算,认为资本市场的转移是城乡之间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土地市场的制度安排及其价格扭曲逐渐成为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推动因素。^④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协同机制方面,王阳主张应当全面推进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服务管理体系、法律制度体系的改革创新,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⑤陈坤秋等提出需要重塑土地市场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实现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滞碍作用向促进作用转变。^⑥贾晋等认为需要在继续加大财政、金融支农等政策力度的同时,构建完备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收稿日期:2020-06-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架构研究”(18VSSJ066)。

作者简介:张世贵,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副编审,法学博士(北京 100089)。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农村吸引资本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⑦在城乡要素市场配置改革的实践路径方面,孔祥智等提出从盘活农村闲置资产资源、破除要素城乡区域流动障碍、强化农村产权保护、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方面深化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⑧李江涛等认为必须在城乡土地同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两个方面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放宽农地入市的限制。^⑨刘运转等认为需要从制度和观念上消除劳动力市场“身份”分割的扭曲,促进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⑩目前,学界对新型要素的研究还不多,主要关注新型要素在农村的开放流动及价值实现。例如张国献主张通过完善城乡技术扩散传导机制以及构建城乡信息交流互动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⑪刘永飞等认为农村产业化集聚与发展能够促进人才、技术、知识、资源集聚和回流,重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⑫柏龙彪提出建立健全农村基础教育资源共享发展制度和公共教育资源开放共享机制,通过推进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城乡均衡发展。^⑬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传统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研究比较充分和深入,但对新型要素尤其是对统筹城乡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还不多。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如何匹配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发挥传统要素和新型要素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叠加效应,构建多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协同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

二、当前我国城乡要素市场面临的新问题

1. 土地要素:城乡收益率与用益权面临新矛盾

当前我国城乡土地用益权和收益率之间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产业发展迎来全面转型和升级,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产业蒸蒸日上,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电气等传统产业面临数字化改造升级,这些变化不断促进交易空间虚拟化、办公和居住空间集约化、生产空间集聚化,引发城市地区对生产、办公和居住土地的需求日益扩大,并与城市未开发土地普遍不足形成了供求矛盾。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土地因产权、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难以充分实现其市场价值,许多农村土地被闲置、抛荒,城乡土地的用益权和收益率差距进

一步拉大。具体而言,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发展,创新型人才加速在城市集聚,城市对实体空间的需求进一步扩张,城市土地供给稀缺性与需求丰富性之间的矛盾凸显。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将农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城市国有土地,并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新配置。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城乡土地同地不同权、不同价等问题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土地收益率的差距。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和市场交易的频率,土地要素的交易也变得更加频繁便捷,但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城乡土地要素的交易呈现明显反差。城市居民对自己所有的房产享有出租、出售、抵押、担保等权利,构成城市居民财产收入的重要方面,而农村居民仅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财产权,其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严格限制,房屋也无法享受出售、抵押、担保等权利,严重阻碍了农民通过土地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一反差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时期将进一步凸显,不利于创新要素向农村的集聚和发展。地方政府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加以调节,虽然短期内可以缓和局部供地矛盾,但也会积累更深层次的城乡矛盾。

2. 劳动要素:城乡劳动报酬体系与社会保障机制面临新差距

在新一轮创新技术驱动发展下,相较于农业,工业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面优势明显,将进一步拉大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反映在城乡劳动所得上,城市劳动报酬与农村劳动报酬的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而且,与之相关的劳动保障制度机制也会因为人才素质的差距而形成落差。例如,农业的经营性收入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和其他工种,这种差距虽然在近几年促进转移性收入大幅增长的政策导向下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支持力量有限,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在城市的快速发展,农业的劳动报酬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收缩趋势。2013—2017年,我国农民的经营净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从41.7%下降到37.4%,与此同时,工资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从38.7%上升到40.9%。^⑭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比有所下降,工资性收入逐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这从侧面反映了农业劳动者与非农劳动者的工资率存在落差,且差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导致农村劳动力单向外流趋

势仍在持续。从长远看,这对农业用工、农民务农、农民增收都是一个巨大挑战。此外,城乡在公共资源配置上的不均衡,加剧了上述落差趋势。以科技发展为例,创新技术发展产生的创新要素和科技资源集聚能够明显带动城市群集聚,产生空间效应,而且高素质人才在城市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升级发展。虽然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在数字乡村政策带动下服务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与城市横向对比,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仍面临扩大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公共资源配置方式涉及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低保等多领域且短期内不会被彻底打破。比如,2007 年城乡人口受教育年限比为 1.30 : 1 (乡村为 1),2016 年这一比值为 1.32 : 1 (乡村为 1),反映了城乡教育不均衡程度的上升;医疗方面,城乡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比从 2007 年的 2.37 : 1 (农村为 1) 上升到 2016 年的 2.54 : 1 (农村为 1),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仍然很大。^⑮二是由于城市公共资源的分配是基于城市常住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导致农民工进城后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而且在城市发展越来越智能化、数字化的今天,农民工因自身受教育程度低、难以掌握现代化技术等原因,从事低端行业居多,在享受城市越来越多带有科技含量与技术操作性的社会福利方面常常处于弱势处境。

3. 资本要素:城乡资本积累率与资金供给率面临新落差

我国乡村地区的物质资本积累率长期低于城市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向城市输入资本,以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市场为继续从农村向城市输入各种隐形资本以保障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重要条件。2006 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农村的资本流向逐步由输出转向输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得到确立,国家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投资绝对额逐年加大,农村金融体系也逐步建立健全。但是,从农业资本积累率和农村金融供给率的角度看,当前城乡之间的资本积累率与资金供给率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一是在新基建发展趋势下,这种差距有扩大风险。新基建主要包括 5G 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七大领域,融合了诸多产业链,建设投资体量巨大。城市由于经济资本较为雄厚,将有能力优先完成上述领域的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但对于资本积累较为薄弱的农村,建设步伐无疑将相对滞后,并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之间资本积累率的差距。二是城乡之间金融资本供给率面临差距被继续拉大的风险。当前,涉农信贷资金供给与农村农民农业的信贷需求存在较大偏差。2017 年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 12.5%,这一比重从 2014 年起,逐年以 0.1%—0.2% 的幅度递减,同期,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占比也出现下降,从 2014 年的 23.79% 下降到 2017 年的 20.9%。这些都从侧面说明城乡之间金融信贷的供给率偏差较大;此外,2017 年农户贷款占比为 6.74%,农业贷款占比为 3.25%,意味着农业以 4% 不到的资本供给贡献了 7.9% 的产值,以 7% 不到的人均信贷资本支持了 41.5% 农村人口的农业生产,意味着金融信贷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失衡。^⑯如果新一轮新基建贷款更多用于城际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充电桩、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农业农村的贷款供给量将可能面临结构性挤压,城乡之间金融资本供给率的差距也可能被进一步拉大。三是农村金融配套服务存在很大缺口。目前农业融资担保服务、农村产权登记交易服务、社会信用信息登记服务和查询服务系统等都很不完善,无法有效解决涉农信贷抵押担保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而导致农村信贷服务成本高、门槛高、风险高等问题,在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和融合创新的新趋势下可能进一步影响农村的金融供给率。

4. 数字要素:城乡普及率与应用率面临新挑战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字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信息的高速传输将引发新一轮的生产动力变革。自 1994 年我国接入互联网以来,数字经济取得了重要进展。21 世纪以来,农村互联网、移动设备加速普及。2018 年 4G 网络已覆盖全国 100% 的乡镇、81% 的行政村,光纤宽带覆盖全国 89% 的乡镇、65% 的行政村,全国农村宽带用户全年净增 2364 万户,总数达 1.17 亿户。^⑰一方面,日趋完善的数字设施拓宽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渠道,乡村出现了电商扶贫、网络直播、线上零售等多种新型农产品销售业态,而且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18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 2305 亿元,同比增长

33.8%。^⑩其中,数字要素表现出良好的经济动能和增长潜力,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添了动力。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22亿,年增长率为6.2%,同期,城市网民规模是6.07亿且年增长率为7.7%,相较于我国城镇地区74.6%的互联网普及率,农村地区仅有38.4%。^⑪中国传统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数字运用能力也偏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字化技术普及,加上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较低,成为影响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的重要短板,如不加以改进,将会加剧城乡之间的“数字分化”,数字要素在乡村流动面临的成本高、费用高、收益低等问题也会阻碍农村农业的数字化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除此之外,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严重制约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

三、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的叠加配置： “知识协同”机理

智能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图谱和深度学习融合应用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形态,本质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智能经济时代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知识协同”,“知识协同”包含“知识维”“时间维”“空间维”“环境维”四个维度,具体指知识管理中的主体、客体、环境等达到在时间、空间上有效协同的良好状态,知识主体之间以“并行”或“串行”方式协同工作,实现在恰当的时间和空间(包括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将恰当的信息和知识传递给恰当的对象从而实现知识创新的“双向”或“多向”的动态过程。在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中,既要看到新型要素的巨大发展潜力,又要将其与传统要素统筹起来,叠加配置。以“知识协同”机理为指导进行要素市场化配置,既能弥补传统要素的流动性障碍,又能加强新型要素在乡村地区的合理布局,有利于提升乡村发展能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1. 知识主体协同,促进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的融合创新

“知识协同”中的“知识维”表示不同知识主体拥有的不同的“知识客体”,知识主体在“知识协同”活动中利用所拥有的知识以知识“项目”为目标参与进行个人或团队的知识创造。在智能经济形态

下,大量的数据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基础原料,以数据承载的大量知识需要在多主体间协同共享,以促进知识融合和创新。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善和城乡协同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通过构建城乡之间的知识主体协同机制来解决和应对。与传统要素配置模式下政府主导的知识创新不同,新型生产要素的培育和配置需要多元主体协作参与。传统要素的配置只需考虑物理空间的布局,而新型要素的配置需要统筹考虑跨地区、跨行业、跨产业的协同。因此,推进知识主体的协同,有利于促进新型要素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合理布局,促进落后地区新型要素和传统要素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和融合创新。以知识主体协同为基础构建劳动虚拟空间供给、资本智能量化投资、土地等量平衡交易的城乡无界流动机制,有利于打破农村资本、劳动、土地向城市单一流向的格局,构建新的城乡生产力布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知识空间协同,促进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的线上配置

知识协同的“空间维”表示由不同的知识主体形成的空间,空间可以是基于物理概念的实体空间,也可以是基于大数据中心的虚拟空间。虚拟空间可以使知识主体摆脱地理位置的约束通过互联网实现快速的“知识协同”。智能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可以集成大量虚拟空间的产品交易活动,将区块链与AI、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结合打造智能云区块链,提供针对不同业务场景的智能化业务模式,如云上办公、数字娱乐、生鲜电商、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将传统经济形态中必须在实体空间发生的交易活动转移到虚拟空间。区块链、数字货币的发展将为“云上空间”的交易活动提供可信环境和交易条件,相应地,要素市场需要顺应这种在虚拟空间进行资源配置整合的转变。在线教育、在线医疗、智慧养老等通过虚拟空间的信息传输为农村地区提供可与城市相融合的等值化服务,劳动力未必只有从实体空间的农村流动到城市,才能为城市提供生产或服务。在虚拟空间,通过远程操控提供信息传输和运行方案,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将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为资本投入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收益率趋于等值化提供可能。这将促进资本投资收益跨越城市和农村的地域限制,缩减传统交易所需的实体空间,推进土地要素在城乡

之间公平合理配置。

3. 知识时间协同, 促进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的平等交换

知识协同的“时间维”是指按照知识项目的生命周期确定的至少满足完成一个项目所需的时间, 知识项目中某个知识主体应当在恰当的时间将恰当的知识传递给恰当的对象。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本质上是城乡要素的不平等交换问题, 而要素的不平等交换实际上反映了生产资料的垄断占有问题, 垄断占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在创新、应用上的时间不协同。在智能经济形态下, 知识时间的协同意味着不同的知识主体对知识的传递和获取具有时效性、精准性、通达性, 或者至少不存在明显的时间迟滞和阻隔问题, 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大数据中心, 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基础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共享, 构建横向联通、纵向贯通的地域信息互通格局, 增强数据中心间的互通能力, 提高数据应用效率和使用价值, 为农村在信息获取以及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创造平等的机会和条件, 不仅有利于城乡间协同创新, 还有利于新型要素和传统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平等交换和分配, 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

4. 知识环境协同, 促进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的公平配置

知识协同的“环境维”包括软环境(如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创新环境)和硬环境(如计算机环境、网络环境、数据环境)。在智能经济形态下, 数据是最基本的原材料, 保障数据的开放、通达使用并进行无界知识共享和创新的环境是资源能否实现有效配置的关键。设施完善的交通环境、流畅通达的网络环境、开明开放的创新环境、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是促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的主要硬环境和软环境, 有利于新型要素和传统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公平有效配置。以边缘计算、5G 传输、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基础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将大大增强土地、劳动、资本、数字等要素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交互流动性, 对破除地区和行业的空间壁垒、增强市场流通效率、促进地区间的要素配置均衡等具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 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将面临新的全面整合机遇, 有望促进各要素在城乡之间更有效率地流通、更加精准地配置、更加公平地共享。通过将城乡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进行灵活的叠加配

置, 有利于改善农村“环境维”, 为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四、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实践路径

基于“知识协同”机理, 通过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和融合创新来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是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方向。当前需要加快形成更加成熟和完善的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1. 主体协同, 促进城乡“数字+”新型基建等值同效

通过构建“企业+市场+政府”的多元主体共建格局, 实现建设主体协同。在此基础上, 不仅需要加大农村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利等传统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更需要加大农村地区 5G 基站、特高压、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智慧农业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利用“数字+”的信息高速公路形成知识主体协同优势, 促进城乡之间新型基建等值同效。具体而言, 一是基于智慧农业具有初期投入大、受益面广和公益性强等特点, 要充分利用多方主体的协同优势构建关键技术平台(如智能传感、作物生长模型、溯源标准体、云计算中心、农业大数据、农业物联网等), 降低信息搜索和经营管理成本, 增强经营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二是促进现代农业技术装备集成载体——现代农业园建设, 加强仓储运输管理和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 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信息化程度, 降低单位生产经营成本, 拓展农业利润空间, 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三是有效开发农村电子商务市场, 扩大电子商务在农村的覆盖面, 支持供销合作社、邮政及其他快递企业拓展乡村物流服务网络, 提升农村电商的专业度, 加强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建设, 积极探索农产品流通新途径, 通过专业化的力量, 缩小农产品流通环节, 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发展从农田到餐桌的鲜活农产品现代物流体系。四是支持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升级改造, 落实农产品批发市场用地等扶持政策, 整合支农资金推进农产品实现大市场大流通。针对不同区域产业发展的现状, 鼓励支持农业龙头企业自主新建或改扩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

2. 空间协同, 促进城乡“数字+”公共资源平等共享

生态空间协同是保证城乡生态产品平等共享的

重要前提条件。要实现生态空间协同,一是要保护好绿水青山和田园风光,重视对林地、湿地及生态系统的养护,积累良好的生态资本,使环境友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不仅能够为社会提供传统的生产、生活、居住空间的功能,还可以为拓展乡村新业态(乡村旅游、农场采摘、自然保护、景观保护等)提供良好基础,让良好生态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二是要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从产业链价值链建设着手,创新农业经营组织销售方式,根据乡村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绿色种养、休闲观光、乡村旅游、度假康养、文体教育等特色优势产业,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工作,打造知名农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三是要提高公共服务空间协同水平,充分利用“数字+”信息化技术推进科教文卫体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平等共享、平等收益。

3. 时间协同,促进“数字+”要素创新价值公平分配

城乡土地增减信息时间协同可推动城乡土地要素价值平等参与价值分配。具体而言,一是进一步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探索闲置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深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规范土地征收管理流程,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二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规范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农业农村抗风险能力。三是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盘活农民闲置资产,保障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财产性收入稳定增长,全面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四是进一步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提高时间协同水平,促进农业经营要素高效参与产业链价值分配。具体而言,一方面要重视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提供系统化专业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推动小农户生产与农业现代化有机衔接,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密切关联,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为重点,不断提升生产经营水平,带动和帮助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另一方面要以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为抓手,建立多元主体分工协作机制,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增强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农民合作社

的服务能力以及家庭农场的生产能力,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4. 环境协同,促进城乡“数字+”知识共享机会均等

环境协同主要分为知识环境协同和管理环境协同。知识环境协同可促进城乡人力资本提升机会均等。推动知识环境协同,就要紧紧围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目标不断提升乡村人力资本质量,将“就地取材”和“引进人才”相结合,紧扣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丰富教育培训形式,壮大农业科研队伍,提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实行对外劳务输出和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并重,大力实施农村“领头雁”培养工程、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农村实用人才培育工程。此外,重点培养年轻党员干部,对后备力量择优储备。制定优惠支持政策,完善服务体系,鼓励引导在外成功人士和返乡人员在农村创新创业,吸纳集镇、永久性村庄和农村社区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管理环境协同可促进城乡现代化管理理念均等共享。具体而言,就是帮助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户采取现代组织方式进行农业产业经营,使优质农产品走向越来越大的市场。在生产环节,要充分利用电商平台和大数据整合农村地区分散的种植、养殖等产业资源,搜集市场信息,推动农村产业经营与大市场有效对接;在营销环节,要积极利用物流网、互联网等平台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畅通农村地区众多产品资源走向城市市场的通道,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注释

- ①参见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②参见王颂吉、白永秀:《城乡要素错配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7期。③参见张克俊、高杰:《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特征、框架与机理》,《东岳论丛》2020年第7期。④参见周传豹、吴方卫、张锦华:《我国城乡要素收入的隐性转移及其测度》,《统计研究》2017年第12期。⑤参见王阳:《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经济发展效率——以劳动力要素城乡配置变化为例》,《经济纵横》2020年第7期。⑥参见陈坤秋、龙花楼:《中国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自然资源学报》2019年第2期。⑦参见贾晋、高远东:《改革开放40年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演进》,《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⑧参见孔

祥智、周振:《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历程、基本经验与深化路径》,《改革》2020 年第 7 期。⑨参见李江涛、熊柴、蔡继明:《开启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新里程》,《管理世界》2020 年第 6 期。⑩参见刘运转、宋宇:《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城乡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人力资本积累》,《软科学》2018 年第 12 期。⑪参见张国献:《利益协调视域下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机制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2 年第 5 期。⑫参见刘永飞、徐孝昶、许佳君:《断裂与重构:农村的“空心化”到“产业化”》,《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⑬参见柏龙彪:《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农村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策略研究》,《农村经济》2017 年第 2 期。⑭《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质量明显改善——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中国政府网, http://www.stats.gov.cn/zjt/zjfx/ggkf40n/201808/t20180831_1620079.html, 2018 年 8 月 31 日。⑮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1—52、256—257 页。⑰⑱参见余俊杰、颜之宏:《“数字乡村”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9-05/24/content_5394514.htm, 2019 年 5 月 24 日。⑲参见《2018 年我国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达 7.3%》,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shuju/2019-05/08/content_5389825.htm, 2019 年 5 月 8 日。

责任编辑:翊 明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Reform Path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Market Allocation

Zhang Shigui

Abstract: The market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break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intelligent economy,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n efficient and fair, free and orderly flow of elemen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t present, China's production factor allocation market is characterized by urban-rural dualism and hierarchy. In terms of land, capital, labor force, data and other elements, there are still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erms of utilization rate, yield rate, profit rate, wage rate, popularization rate and application rat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superimposed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new elements and traditional elements, and improve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production efficiency,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circulation efficiency of "digital +" elements through the four-dimensional cooperation of knowledge subject, space, time and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marketization of factors; "knowledge coordination"; reform path